

論新道德

加里寧 著
雅羅斯拉夫基

东北书店

遼東總分店印行





論 新 道 德

1949年6月初版

安·2000

基本定價：145 元

論新道德

著 加 里 寧
羅 斯 夫 基

東北書店總分店印

1949·6

論 新 道 德

著 者 加 里 寧 等

出版者 東北書店遼東總分店
發行

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及代銷處

印刷者 遼東總分店工廠

1949.6.翻印

1—2,000

目 錄

論我們蘇聯人民的新道德

加里寧（一）

論蘇聯新道德

雅羅斯拉夫斯基（三）

論我們蘇聯人民的新道德

加里寧

道德或倫理，從人類社會開始形成時起就有了，歸根到底而為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所決定，當然，它也像法律，宗教等等每種思想上層建築一樣，不是機械地適應於經濟發展，而是落後於經濟的發展。在人類社會初期，道德是從生活條件中成長起來的，而在實踐中逐漸構成人們的行為準繩。當然，這些準繩，並沒有定為任何成文的法規——當時還沒有文字；但當時人們之應遵守這些準繩，大概是並不亞於我們之應遵守現代的成文法規的。對公社，宗族，家庭的關係，男女相互間的關係，生活的關係已日趨鞏固，變成為公認的心理軌範和社會中的道德。

自人類社會劃分為階級和國家出現時起，自然，道德也隨之成為階級的，變為統治階級手中奴服群眾之強有力的工具。恩格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寫道，那裡至少有三種道德：『封建貴族階級的道德，資產階級的道德和無產階級的道德』。『因為直到現在，社會都是在階級矛盾中發展，所以道德也總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是辯護統治階級底統治和利益，或者也反映那個雖被壓迫，但已充分強固的階級之反對這一統治的義憤，並捍衛被壓迫者將來的利益』（反杜林，一九三四年俄文版，第六六頁）。

每個時代——奴隸時代，封建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的統治階級都力圖掩飾自己的統治，拿自己狹隘的階級利益來冒充全民的利益。他們把自己剝削者的道德冒充為全人類的道德，把它列入永恆真理，即基於超人類社會，不依人為轉移，不依該社會經濟制度為轉移，而似乎祇是出自上帝的永恆

真理之列。

時過境遷，舊的社會經濟形態相繼死亡，隨之而起的是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德行，道德的問題成了哲學部門之一。形而上學哲學家和煩瑣哲學家，竭力在這些棘手問題上用工夫，而以那些基於人類智力所不能理解之虛渺概念的道德規律，來辯護現存狀況。這當然不是說，形而上學者和煩瑣哲學者幾百年來的工作對於發展人類知識和思考邏輯，沒有積極的結果。但一般說來，他們都是趨向於一個目的，即使道德服務於統治階級的利益，設法辯護少數剝削者對於大多數被剝削者的壓迫，並承認這是合乎道德的狀況。

西歐文學，一般是服務於資本主義社會利益的，但畢竟也給了不少抨擊資本主義的優良作品。例如深知資本主義社會的巴爾扎克，在其所著郭里奧老爹長篇小說中，子爵夫人波謝安授意大學生拉斯清雅克說：『你打算得愈冷酷，你的前程就愈遠大。你毫不留情的來打殺吧，人們就會怕你的。你看待男人女人，要像看待你乘坐的驛馬一樣，那怕它在下一站就死掉……但如果天良一旦出現時，那你就把它當作珍寶匿藏起來；讓誰也猜不着它，否則你就會招致死亡。』你就會從劊子手變成犧牲品的。

俄國也像世界各國一樣，道德的原則也隨着社會的發展而變更了。沙俄統治階級的道德，是基於沙皇制度的三大原則：『專制制度，正教和秩序』。這是人民中最反動階層：地主，貴族，軍閥，上層官僚和皇族——連其全體婢僕在內——聯合及領導一切反動力量的所謂『上流社會』的三大原則。這一統治階級的全部努力，是在於保持自己的特權並強制人民處於服從地位。雖然貴族階級本身已不怎樣重視沙皇個人的道德意義，但這並不妨礙它在人民中來進行廣泛的鼓動，說沙皇是天選主宰，他

的權力是上帝所賜與，因此他的一切決定都是公正無訛的。

有一種與貴族，君主上層分子的狹隘利己道德相反的新道德原則，即憎惡剝削者，酷愛人民，酷愛祖國的新道德原則胚胎了。俄國的優秀人士曾獻出全部精力和生命來幫助農民擺脫農奴的依賴地位。拉仁和蒲加覺夫所領導的兩次起義，使貴族階級中最開明的人們不得不對當時情形加以思考，並喚起他們對農民的狀況和地主的恣意專橫加以批判。

俄國十八世紀的文學作品，部分地是在法國啓蒙主義者影響下，表現了革命道德的最初萌芽。這種文學作品最燦爛的代表是拉第希夫，在他所寫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記中，對農奴制度給了致命的批評。他鮮明地描繪了農奴生活的可恥情景（地主把農人家庭整批或分散出賣，交去當兵，地主對自己奴隸的任意侮辱和蹂躪），憤慨地指謫了農奴制度，指謫了農奴制度的殘酷性，認定捍衛自己人權的農民之任何行動都是合理的。他訴之於同代人的理智說：

「農夫迄今仍是吾儕間之奴隸；吾儕非特不公認其為平等同胞，亦且忘乎其為人。嗟我至愛之國人！嗟我邦國之子弟！試環顧左右，一識汝等之迷悞可也……」

詎知吾儕間披枷帶鎖者誰？農夫！為奴為隸者誰？農夫！彼等肥吾輩之軀，飽吾輩之腹，促吾輩於健康，致吾輩於永年，而無權享其所耕，食其所作……

夫俄羅斯公民中，三之二被褫奪公權，甚且皂隸不若，如此國家，焉能稱之為幸福國家？如此公民，焉能稱之為幸福公民？唯貪慾無饜之徒乃能侈言：農夫幸福，因農夫全不知優良生活為何物故也……

寥寥無幾之矜驕公民沈溺於窮奢極侈之中，而益千累萬之輩則衣食無所贍，寒暑無所避，如此國

家，焉能稱之爲幸福國家？勿寧聽其荒蕪之爲愈也！」

（見拉第希夫全集一九三八年版第一卷，第三一三，三一四，三一五，三一七等頁）。

拉第希夫關於教育問題的意見，直至今日還可認爲是進步的。

道德所包括的情感範圍極爲廣泛，爲在社會面前表達這種種情感也就需要發達的語言。偉大俄國學者羅蒙諾索夫耗費了很多精力來創造俄文，這就促進了俄國社會對當時新思想的接受。羅蒙諾索夫說：

「俄羅斯強國所藉以支配着世界很大一部分土地的語言，適應着俄羅斯的強力而具有自然的豐富性，美麗和力量，在這方面，它並不遜於任何一種歐洲語言。他認爲俄文具有『西班牙文的壯麗，法文的活潑，德文的剛強，意大利文的溫柔，還加上希臘文和拉丁文的特點：內容豐富，敘述簡截』。

十九世紀上半期的文學，大大推進了俄國社會政治思想的發展以及對自己人民底認識。

蓋爾村，別林斯基，契內舍夫斯基，多布洛留波夫，涅克拉索夫對於已爲當時社會頗大一部分群眾所信仰的革命道德之發展和加深，給了一個強有力的推動。他們喚醒了那時的人心，促使人們對生活，對生活中能作些什麼有益事業的問題加以思索。在俄國文學和政論文章的歷史上，未必還有誰像別林斯基，契內舍夫斯基，多布洛留波夫等人這樣支配着人們的頭腦，這樣有效地提高他們的公民自覺，推動他們去爲民主革命而與專制制度作鬥爭。而且他們個人的生活，完全貢獻於發展俄國民主的事業，所以社會先進人士都認爲這是高尚道德的楷模。

別林斯基寫道：『不愛祖國是不能的……只是要使這愛國心並非消極的滿足於現成的一切，而要

有改造一切的熱烈願望；總之，愛祖國應是兼愛人類……愛自己的祖國，這就是說，熱烈地希望祖國成爲人類理想底體現，並盡力來促進這點』。

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喚起每個誠實人對於奴隸主的憎惡，對人民的愛戴，號召人民去作鬥爭：

『爲祖國的光榮，

爲信念，爲愛感……

去赴湯蹈火吧。

捨身赴國，死作完人吧。

你是不會白死的……

當爲事業流血時，

事業就堅固了。』

他心靈的呼聲——『你可以不作詩人，但定要做個公民』——不由的喚醒了俄國社會廣大階層中優良的公民感覺，叫他們意識到自己在國家和人民面前的道德責任。

『批評資產階級，在群眾中發展對資產階級的憎惡，促進階級自覺，善於團結自己的力量』（列寧全集，第三十卷，第四〇九頁），這就是十月革命前馬克思主義道德的基本內容。新道德由兩個正相反對的方面在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中培植起來了；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者知識分子所進行的宣傳；另一方面是發展着的資本主義以其殘酷的剝削勞動手段推動工人去作反抗。因此勞動者利益一致的意識，對國際團結的號召，就容易爲工人所接受。無產階級的道德，是在工人日常生活中，即在工廠和作

坊中形成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工作不過是擴大了對無產階級倫理的瞭解範圍而已。

例如毆打工賊，暗探，告密者及降低工價的兇惡匠目的行爲，工人們認爲是公正的報復。工人間的利益一致，尤其在和企業主衝突時工人間的利益一致，這即令不是全體工人，至少也是極大多數工人所瞭解的。當然，這並不是說，工人的行動常是一致的。除了工廠管理機關所僱傭的暗探和奸細以外，在工人中間還出現了一些愛出風頭的人，他們力圖鑽到匠目地位，擔任管理的職務，因而也就與工人群眾隔絕。

企業中的每次罷工，每次多少有些意義的衝突都招致懲罰：開除所謂倡首者，上黑名冊，逮捕。工人們捐款幫助被害的人，儘可能來幫助他們。甚至某些匠目也參加募捐，有時還幫忙把被開除的工人安置到旁的工廠工作。這在工人中認爲是道德義務。

但在初期，所有這些都帶着一種無組織的性質。直到革命運動愈加向前發展，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愈益覺醒，無產階級愈從自在階級變爲自爲階級，才逐漸形成對本階級忠誠，遵守紀律，互相援助，鬥爭中犧牲自我的精神和組織性等道德品質。無產階級道德面貌的這些特點成了正在產生着的社會主義道德的基礎，這種道德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與資產階級道德對立的，資產階級道德所具有的殘酷，掠奪原則就是：『人對人是狼』，『各人都爲自己，只有上帝爲大家』，『力圖出頭』等等。

我黨的宣傳在工人群眾中起了莫大的改善品質的作用。可以大膽說，俄國的工人知識分子正是由於馬克思主義宣傳鼓動工作的開展，秘密小組的組成，才開始形成起來的。宣傳家和組織者把工人團結爲一個緊密而有組織的力量；他們灌輸了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道德，這種道德之深入工人群眾，較之外表上所能看到的要深刻得多。革命的道德不僅浸潤了社會關係的領域，而且也浸潤了工人階級底日

常生活。

俄國革命前知識分子可引爲光榮的事，就是革命前知識界中早已出現了許多天才的思想家，美術家，文學家以及爲人民幸福而鬥爭的熱情戰士。繼革命民粹派癩爛星群之後，有馬克思主義者本着當然權利代之而起。誰不知道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這二十年的政治刊物中，民粹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關於俄國經濟和革命思想發展道路的爭論呢？當時爲革命前夜的現實狀況：城市中的罷工和遊行示威與哈爾科夫，坡爾塔瓦及其他省份的農民起義和焚燒地主莊園的事件爭先恐後地相繼而起，這就決定了這一鬥爭底原則性。

在這一反專制制度和反資產階級地主制度的鬥爭中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思想，由散漫的工人小組建立了社會民主工黨，該黨在一九〇三年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和孟什維克分裂後，獲得了社會民主工黨（波爾什維克）的名稱。波爾什維克黨，與整個工人階級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下，堅決走上了爲工人階級利益而鬥爭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道路。革命馬克思主義底思想在工人中間成長和鞏固起來了，列寧論反專制制度鬥爭中工農羣衆利益一致的思想，論必須舉行武裝起義的思想，在工人中間日益根深蒂固起來了。

一九〇五年革命，雖然其成果不大和工人階級暫時遭受失敗，但終於不僅大大提高了工人的階級自覺，而且也大大提高了農民的階級自覺，使其獲得了我黨領導下的革命鬥爭的豐富經驗。人民已在實踐中看到了武裝捍衛自己利益底可能；當然，這不能不印入人們的腦際，不能不影響到他們精神上政治上的感覺和情緒。

當時在資產階級知識界，小市民，同情孟什維克的工人上層分子中，由於革命失敗的結果，其革

命情緒大爲低降，唱着埋葬革命的喪歌，而宣傳所謂「合法的」利己主義，我們的黨則獨樹一幟，拒抗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不僅不放下革命鬥爭的旗幟，而且還鞏固了自己的隊伍，與各種機會主義表現進行殘酷鬥爭，而把動搖不定的同路人清洗出去。這一工作，大部分是由列寧和斯大林進行的，很快就有了成效。

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我黨影響下生長成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其結果是無產階級和貧農完全戰勝了沙俄舊制度和資本主義。偉大的歷史轉變關頭已經渡過了；新的生活開始了。人民走上了從來沒有探索過的新道路。它抱定了偉大的目的——要在沒有人剝削人現象的社會主義新基礎上來改造自己的生活。爲此就需要澈底破壞舊的社會關係，因而也就要改變人的道德面貌。

這也是很自然的，因爲在俄羅斯這個在生產方面和社會生活方面各種制度如此離奇錯綜的國家裡，要在新的社會經濟基礎上進行改造，就使我黨及其領導機關必須大大緊張精神力量，必須進行多年的鼓動和宣傳工作，才能在群眾中養成共產主義的道德。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道：「爲了廣泛培植這種共產主義意識，以及爲了達到共產主義，就必需大批的改造自己，這個改造只是在實際運動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實現；因此，革命之所以必要，不僅因爲沒有旁的方法可以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爲實行推翻舊制度的這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擺脫一切舊的卑劣東西而成爲能够建設新社會的階級」（馬恩全集，第四卷，第六〇頁）。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把俄國各族人民的道德升到了更高的階段，而成了人類社會中最高尚的道德。這裡並沒有誇大其詞；這只是根據目前現實所作的客觀結論。當然，這並不昞說，人們在某一天忽然得到了上帝賜予的一種社會主義的新道德。馬克思早就指出過，人們的意識是落後於經濟的發展

的，因此決不能單靠一個革命的改革來一下子把一切資本主義殘餘都消滅掉。

馬克思學說的偉大，就在於馬克思發現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只有工人階級是能改造生活的力量。列寧寫道，馬克思主義「與舊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區別就在於烏托邦社會主義不想由那些爲血腥的、卑劣的、掠奪的、小店主式的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普通人來建設新社會，而想由那種在特別煖床以及溫室中所培養出的特別善人來建設新社會。現在這種可笑的思想已爲大家所恥笑，大家所拋棄了，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或善於來思索與此相反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畢竟怎樣才可以（而且應當）由那些被千百年來的奴隸制，農奴制，資本主義，散漫的小經營所敗壞了的普通人，被那爲爭奪市場上的小塊地盤，爲爭奪產品或勞動的更高價格而進行之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所敗壞了的普通人來建設共產主義」（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四五八頁）。

的確，群眾是不容易領會社會主義新道德的。無產階級和貧農的勝利起初甚至遇到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強烈反抗，更不用說被推翻的階級了。就是工人階級本身，尤其是農民，也不能一下子解脫由地主資產階級幾百年來統治所薰淘的習慣，風俗。不是每個工人都瞭解，他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是個無家可歸的無產者，實際上並沒有祖國，而祖國對他却無異於後母；他只在十月革命後，才由不幸的無產者變爲偉大國家底公民，變爲社會主義國家千百萬建設者集體中之平權的一員，而成爲國內一切現有財富和潛藏財富的共有者。

愛好勞動是共產主義道德主要成份之一。但只在工人階級勝利之後，勞動——人類生活的這個堅定不移的條件——才不會是煩重的，可恥的負擔，而成爲光榮英勇的事業。

革命前有次我參加一個工人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對於工人在作坊中要如何作工的問題發生了爭論

。一些人認爲，既然我們是替資本家作工，那就沒有特別努力的必要；只執行主人和工匠的起碼要求就夠了。另一些人則反駁說：爲了職業的榮譽，決不能做出劣等質量的製造品來；工作底優良質量能給予一種精神上的滿足。

當然，這個爭論是純粹帶着理論的性質。誰都知道，工匠和主人，是會要求高度的工作質量，並要極仔細地來注意這點的。可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難道還會有人提出，那怕在理論上提出這樣的問題麼？恰巧相反，一般的無產階級道德無條件地要求只做生產質量優良的產品。

在鄉村中，領會社會主義道德的過程，當然要困難得多。而這是自然的。那裡私有財產的積習更深；那裡土地的佔有形式和耕作方法在各地有重大的差別。有些地方是公社式的土地所有制佔優勢，在另些地方則是農戶制的經濟佔優勢。各地生活中之社會關係和習俗關係，使這些農民階層的道德面貌起了重大的區別。

當農民的根問題——實行集體化問題——列入了議事日程時，很多人都覺得有不可克服的困難。農民是難於走向他所不知道的集體經濟道路，難於開始把生產工具社會化的。本來中農也只有少許的財產：一匹帶馬具的馬，一套原始的耕具——犁，耙，更不待說貧農了。然而當時很多農民覺得，他交給集體農莊的財產比別人多，他替集體農莊作的勞動比隣居多。還要估計到，在每個甚至是小鄉村裡，也有富農或帶富農傾向的人，這些人有時公開地，但常是暗地來與集體化作殘酷的鬥爭，力圖用一切方法來瓦解集體農民，誹謗集體農民中的先進積極分子。

但由於蘇維埃政權的威信，黨和斯大林同志的威信，所以集體農莊制度在我國勝利了。農民相信，蘇維埃政府和黨是力求真正改善農民生活的。集體農民已與社會主義制度打成一片，而成了它的

積極建設者。隨着農民經濟基礎向社會主義方面改變的過程，農民底心理，農民對國家，對公共的社會主義財產，對勞動的態度，彼此間的相互關係，也逐漸開始變更。總之，社會主義的道德在農民中獲得了發展的良好基地。

在我們蘇聯，城市和鄉村中的勞動——從最簡單的直到熟練的勞動——獲得了深刻的內容，爲社會主義偉大思想所鼓舞，成了革新人，和以共產主義道德精神來教育人的創造基礎。『當一般普通工人表現奮不顧身，克服困難勞動去關心增加勞動生產率，關心保護每普特糧食，每普特煤，每普特鐵和其他產品，這些產品既不是用來供給勞作者自己及其『近親』，而是供給『遠親』，即供給那起初聯合爲社會主義國家，而後聯合爲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幾千萬以至幾萬萬人們的整體社會，——當一般普通工人表現出這種精神時，便是共產主義的開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四二頁）。

列寧所提出的這個衆所週知的原理，再好不過的說明了無產階級勝利後，人們對勞動觀點發生了如何深刻的變革。現在我們有充分權利說，我國的社會主義勞動，社會主義競賽，斯達漢諾夫運動，都成了共產主義道德堅定不移的原則，成了蘇維埃人的品行準繩。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軍不宣而戰的侵入了蘇聯國境。

我全國人民孜孜不倦地工作了二十四年；同時不斷地緊張一切力量和能力來學習，學習再學習。蘇聯各族人民，在爲發展工業和農業的鬥爭中，在爲提高一般文化，科學，技術，藝術的一致頑強努力中，更加親近溶合起來了。

這在烏茲別克人民對烏茲別克戰士的宣言中表現得異常明顯：

『你的同胞都是蘇聯的兒子。俄國人，烏克蘭人，別洛露西亞人，阿捷爾拜疆人，格魯吉亞人，

阿爾明尼亞人，塔什克人，土爾克明人，卡查赫人，基爾吉茲人和你一塊在二十五年來不分晝夜的建築了我們的大廈；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文化……

而現在，德國匪徒闖入了你的長兄俄羅斯人的房子，侵入了你的弟兄別洛露西亞人和烏克蘭人的房子。德寇帶來褐色的瘟疫，絞架和鞭子，飢餓和死亡。但俄羅斯人的房子，也就是你的房子！因為蘇聯，是個友愛的家庭，那裡每個人雖然都是住在自己的家屋裡，但庭院和經濟却是統一而不可分割的」。

人們說：要與敵人進行勝利的鬥爭，就須知道敵人。德國法西斯蒂並沒隱藏自己的原則和目的以及他們認為理想人物的「道德面貌」。

希特勒會說：「我們只應當服從我們的本能。我們要回轉到兒童時代，恢復天真爛漫的本性……人們咀咒我們……說我們是思想底敵人。那又有什麼了不得，我們就是這樣的人……我很感謝命運，感謝它剝奪了我受科學教育的機會。我能够絲毫不受無數成見的束縛。我覺得自己很舒服……我們要培養出這樣的青年，使全世界都會在他面前發抖：要培養出峻嚴的，苛刻的和殘酷的青年……我想，使他們活像一些年輕的野獸」。

希特勒在與拉烏施寧格的談話中就簡直毫不忌諱：「在我們面前擺着減少異族人民的任務……必需擬定出縮小異族人民的技術。我有權消滅像昆蟲類樣繁殖的下等人種，誰又能加以辯駁呢……要首先做到把斯拉夫人底數量減少。斯拉夫人和東方各族人民的巨大繁殖力，對北方的白人是一種極大的危險。必需使統治民族役使大批奴隸」。

充滿戰勝全世界信心的德國人，以為能不受懲罰地來侮辱人類，能不受懲罰地來消滅千百萬人，

以利於『日爾曼黃毛鬼子』。

德國指揮部依據於這些『原則』，而在作戰中，也就採用着適當的方法。德國指揮部會在一個以『備忘錄』形式印發給自己兵士的宣言中寫道：

『應牢記並加以執行：

(一) 你要在早晨，白天，夜裡，常常想着元首，讓旁的思想不來攪擾你，要知道：他在替你思索，替你作事。你只應當行動，什麼也不要怕，你這個德國兵士，是個鐵身子，無論子彈刺刀都是碰不着你的。你是德國鋼鐵作成——你既沒有神經，也沒有心臟，也沒有哀憐心。戰後，你對於你的子女，對於偉大的德國又會獲得新的心靈，敏慧的心靈。而此刻你就毫不動搖的堅決行動吧。

(二) 你沒有心臟和神經，因為在戰爭中是不需要這些東西的。消滅你自己的哀憐心和慈悲心吧，——殺盡一切俄國人，一切蘇聯人吧，不管在你面前站着的是老年人或是婦女，是女孩或是男孩，你都不要住手吧，——屠殺吧，你就可以藉此拯救自己，免於死亡，保證你家庭的將來和流芳百世。

(三)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經住德國人的攻擊。我們要使全世界屈膝。日爾曼人，是世界上的絕對主人。你將決定英、俄、美的命運。你是日爾曼人，就要拿日爾曼人的品質，消滅在你道路上進行反抗的一切生物，你要常想高尚目的，常想元首，那你就會得勝。無論子彈，刺刀都是傷不着你的。明天，全世界就會在你面前屈膝』。

還可列舉德國官兵成千的信件和日記來作例子。所有這些文件彼此都是相似的，都表明德國人是個貪婪無厭的貪財漢，是個執行最血腥任務的笨手，是個把自己想像為『高等人種』和妄自矜傲的愚

夫。

這個爲「人種特殊論」和「地理政治說」的法西斯狂妄思想所強喂起來，自然就排斥人類共同道德的軍隊，向東突進，滿望獲得輕易的勝利。

必須指出，德國指揮部之認爲對蘇聯的勝利已有保證，不僅是由於它的狂妄的自信心。而且這種信念在某種程度內，也爲仇視蘇聯的外國報紙之多年不斷的中傷譏謗所燃熾，這些報紙會誹謗我們的一切成績並特別頑強地武斷說蘇聯人民精神和政治上是很不堅定的。因此戰爭初期，許多外國軍事專家，都爭先恐後的計算了蘇聯最後失敗底時期。現時全世界都知道，所有這些「專家」是怎樣的大錯而特錯了。

我國人民即在最困難時日，也相信能最終戰勝德國。這一信念是基於我們的物質能力，是基於大家已經認識，當爲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已工作了二十四年的人民，手裡握有武器時，是決不能被戰勝的。

戰爭的確是對我們國家穩固程度，它的經濟實力，政治領導底正確性以及人民精神，政治狀態堅牢性之最嚴重的考驗。正是我軍對德國法西斯軍隊精神上的優勢，成了保證我們勝利最重要因素之一。現時當德國法西斯寇軍，已充分地遭到挫折，並已逐出我國領域而瀕於崩潰時，這種情形已可顯然看到了。

法西斯帶上台時會宣言說：「讓他們稱我們爲野蠻人吧，我們是不願意有文化的」，於是一下子就焚燒了兩千萬本書籍。

在我國，黨認定文化革命事業具有極大的意義。

不來說黨和政府對於發展工農業，組織和武裝現代軍隊等日常關心的情形，單講黨和蘇維埃政府在發展文化和啓迪民衆的事業上所耗費的勞動就是難於計算的。一般外國觀察家，除極少的例外，在估計蘇聯的文化和知識水準時，常以革命前時期的情形爲標準，有時他們也說到這一水準在蘇維埃政權年代的提高，但他們就把它來和資產階級國家內的文化發展作比較。其實只要列舉我國文化機關發展的幾個數字，就足以使人信服這一發展是如何巨大了。

蘇聯在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按受普及教育的學生數目來說，就已佔世界的首位，比大不列顛，德國，法國，意大利受同樣教育的學生總數多至一點二倍，我國的大學生比這些國家加上日本的大學生總數多至一點四倍。單在列寧格勒戰前的大學生數目，就比整個法西斯蒂德國的大學生還多。

到一九三九年初，蘇聯就有二十四萬七百六十五個圖書館，藏書共四萬萬四千二百二十萬三千八百冊。蘇聯大衆圖書館的數目較一九一四年增至了六點二倍。只國立謝德林公衆圖書館，就比柏林國立普魯士圖書館藏書多至三點二倍。

我國社會主義的文化，是以列寧所擬定的下列原則爲基礎的：『從前人類全部智慧，人類全部天才之從事創作，都不過是爲了把技術和文化底一切果實給予一部分人，而對於另一部分人則剝奪其最必須的東西——教育和思想的發展。現在，技術底一切奇蹟和文化底一切成就都會成爲全民享有的財富，今後人類的智慧和天才永不會變爲壓迫工具和剝削工具』。

蘇維埃政權毫不吝惜資財來使人類理智所創造的一切優良成果，成爲全民的財產。德謨克拉特，亞里士多德，笛卡兒，斯賓諾莎，福爾特爾，狄德羅，愛爾法修，阿爾巴哈，費爾巴赫，拉第希夫，蓋爾村，別林斯基，契內舍夫斯基，多布洛留波夫，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羅蒙諾索夫，門得列

也夫，謝切諾夫，麥奇尼可夫，巴夫洛夫，齊米良節夫等人的著作，幾萬冊幾十萬冊的出版。像拜倫，巴爾扎克，海涅，歌德，蠶俄，狄更斯，左拉，莫泊桑，羅曼羅蘭，賽爾凡提斯，法郎士，莎士比亞，鮮勒等人這樣的世界文學典型作品，出版了幾百萬冊。

普希金，戈果里，格里波也多夫，萊蒙托夫，蓋爾村，涅克拉索夫，薩爾退可夫——謝得林，列夫·托爾斯泰，柴霍夫，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俄國文學典型作品印行到幾千萬份。俄國人民也認識了蘇聯其他各族人民——舍夫琴科，阿洪多夫，魯斯塔維里，屠曼揚，蕭洛門——阿雷恆等人的學典型作品。蘇聯其他各族人民已得到享受俄國和世界文學寶藏的機會了。請看下面這些足以表明一切的數字吧：

作家的作品	出版的文	
	革命前	革命後
普希金	九	六六
萊蒙托夫	五	二六
列夫·托爾斯泰	○	五四
涅克拉索夫	—	二一
薩爾退可夫——謝得林	—	二四
柴霍夫	五	五三
歌德	—	六
羅曼羅蘭	—	一三

民衆歌人，民衆詩人，民衆說書家：詹布爾，薩退爾干諾夫，斯塔爾斯基，察達斯，別祖波娃，克留科娃等人所唱出的詩歌，所述的故事，在蘇維埃制度下廣泛傳播起來了。

我國的戲院不僅在蘇維埃文化中，而且在世界文化中也應佔領導地位。蘇聯戲院也像蘇聯國家一樣，按其性質，是多民族的。在革命前我們許多民族的戲院藝術，還只處於萌芽狀態，但到蘇維埃制度下却得到了全面的發展，並在本民族文化中佔着光榮的位置。比方，在阿爾明尼亞，土爾克明，塔什克，基爾吉茲先前沒有專業戲院；現在這樣的戲院，阿爾明尼亞有二十七個，塔什克有二十三個，基爾吉茲有二十一個，土爾克明有十一個。烏克蘭革命前三十五個，而到一九四〇年時，已有一百二十五個；格魯吉亞先前有三個，現在則有四十九個，烏茲別克先前有一個，現在則有四十九個。

連在沙皇時代還沒有自己文字的一些最小的民族，現在也有幾個本民族的戲院，並在其基礎上發展它們的民族藝術。

俱樂部，電影，博物館在蘇聯有了巨大的發展。到一九三九年初已有十多萬個俱樂部，其中有四萬一千個集體農莊俱樂部。蘇聯電影機的數目，在一九三九年較一九一五年增至了二一點九倍。一般講來，民衆最愛好的藝術之一的電影，只是在蘇維埃政權下，才發展了起來。

在這次戰爭爆發前，我國有七百九十四個博物館，革命前至多不過有幾十個，而且主要是在首都（彼得堡，莫斯科）。只有單個的大城市，像基也輔，哈爾科夫，梯弗里斯這樣的城市，才有規模不大的博物館。現在差不多我國所有各共和國首都都有美術陳列館，簡直每個省城都設有博物館，搜集該邊區或省區各種珍品以及當地藝術匠師作品底標本陳列其中。

此外，每個城市，如果有某一著名作家，音樂家，美術家誕生和居住過的，都以極大的熱情來蒐

集與其生活和創作有關的一切材料，並建立以其名字命名的博物館；熱心來參觀的，不只是當地的居民，而且也有遠方的客人。例如專門紀念柴霍夫的博物館，不僅在這位偉大俄國作家生長的故城塔干羅格，而且在他度過晚年的雅爾塔也有組織些人們對博物館的要求竟是這般的迫切，而使創立博物館的工作，甚至在目前人民最爲困難的軍事時期，也沒有停止過。報紙常常載有我國各地開辦某某博物館的消息。不久前，在嘉桑組織了國家博物館文學分館。赫列熱門省黑瓦城毛里塔尼亞宮中的省立博物館正展覽着關於古代赫列熱門歷史的新材料。

戰爭已進入了第四年。現已轉到德國境內作戰。此刻德國人已經更切實，更具體地親身嘗到了戰爭底滋味，雖然，聯盟軍隊之進入德境，當然沒有向德國人民作出希特勒分子在其佔領國內，尤其是在蘇聯所作的那種搶劫和暴行。德寇在我國鄉村和城市中和平居民施行極殘酷的蹂躪。整個德軍，從總指揮直到士兵爲止，都搶劫掠奪過；全體德寇，從希特勒起到普通兵士止，都幹過拷打，屠殺人的罪行。

蘇聯人民在戰爭初期似乎是猶疑不定，不知道怎樣去同闖入的盜群和殺人兇犯作鬥爭。從「文明」歐洲來的野蠻侵略竟使很多人喫驚，覺得這種野蠻侵略怎的也不能和他們關於歐洲的概念相適合。斯大林同志在其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的廣播演說中指出說，與法西斯德國進行戰爭，這不能認爲是兩個軍隊間的戰爭，並號召進行偉大的全民戰爭來反對法西斯侵略者。人民在這個號召中獲得了與敵人作鬥爭的具體形式，寧肯手持武器去戰死，而不願成爲法西斯獸園裡永遠的奴隸。直到那時國外人士才看到——而且不能不看到，——才知道，——而且不能不知道——蘇聯人民底精神力量及其高

度的精神政治狀態。

的確，也不能不承認我國軍隊的英勇，不能不承認我全國人民在困難當頭的危險時分所顯示的那種巨大的勞動和對蘇維埃祖國的無限忠心！

我國工人階級在克服戰時的困難中表現了這樣的自我犧牲精神，這樣頑強的來精習技能，這樣的自覺，這樣的遵守勞動紀律，在世界上任何別的國家中未必能找到同樣的例子。而斯大林同志對這種勞動英雄精神給了高度的估計，他聲言說：「紅軍在個對個的長期嚴重鬥爭中，在軍事上戰勝了法西斯匪軍，同樣蘇聯後方勞動者，在與希特勒德國及其幫兇單獨決戰中，在經濟上戰勝了敵人」。

大家知道，調整那些從淪陷區撤退來的工廠工作是在怎樣的困難條件下作成的呵。人們會須在新地方，迥非尋常的情況下，建築工廠房屋和居住房屋，同時還要把生產佈置好。這個任務，他們是完成了的。工人們在給前線生產緊急定貨時，就一連幾晝夜的不離開企業。

新的建築也是在所有這些難以置信的困難條件下繼續不斷地進行着。烏拉爾人寫來的總結報告上，這樣說：「我們甚至在和平年代也沒有過這樣的建設速度……在一九四三年，我們建成了十個馬爾丁爐，四個礦井，兩個煉焦爐，此外有許多煉鐵爐，展鐵機，鑛井，電站，煤井和煤層斷面，正在建築中。並修築了許多坦克場，延長了幾百公里的鐵路。一九四三年建造了幾十萬平方公尺面積的住宅。在斯大林烏拉爾底心臟——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城，通行了一無軌電車，自來水管擴大了，美術影片製造廠也落成了……」

庫茲巴斯勞動者致斯大林同志的新年報告中，已講到他們一九四三年的勞動成績說：「在一九四三年，庫茲涅茨克冶金聯合廠底熔鐵工人達到了我國煉鐵爐底最高生產效能。冶金聯合廠底鍊鐵間不

僅執行了國家計劃，並額外出產了七萬八千噸生鐵。

庫茲涅茨克冶金聯合廠，較之一九四二年來，一九四三年煉鋼工人多煉出了七萬噸鋼料。展礦工人多展出了七萬三千噸鋼。煉焦工人，多出產了五十萬噸焦煤。冶金工人大大提高了上等鋼和上等鋼板的出產，化合鋼的生產也較上年增至了三倍半。

我們收復區的工人，在恢復被德寇所破壞的工業時，表現着極大的英勇精神。

斯大林省的煤礦工人在致斯大林同志的信中曾說到他們是在怎樣一種條件下來調整掘煤工作：

「我們在某地一被克復後就立即着手來恢復已遭破壞的礦井。人們像參加戰鬥一樣的參加了這工作。煤礦工人常常遇着危險。德寇把『庫依貝舍夫煤業托辣斯』所屬的『斯摩良卡』——二號礦井統統安了地雷，直井被炸壞後，塞得水洩不通。人們冒着每分鐘有被泥土葬埋的危險，不分晝夜逐步地來清除礦井的入口。最老的打樁手們領導了這一奮不顧身的工作，用自己的大胆剛毅精神來鼓舞礦工。第三天往礦井去的進路就已打通。新的鬥爭階段開始了。爆炸手們不顧危險，從礦井裡拔出了德寇所安放的三百多公斤炸藥。志願礦工站在淹及腰際的冰水裡，撈起了淹沒的機械。

德寇把『馬開葉夫克煤業托辣斯』所屬的『卡甘諾維赤』礦井的煤層放了火。大無畏的煤礦工人都下到了礦井去救火。英雄們同火鏟鬥爭了三天三夜。終於把火撲滅，修復礦井，重新開工，每天出產大批的煤。

在『阿爾覺蒙煤業托辣斯』所屬的『加里寧』礦井中，青年鏗匠們站在冰冷的水裡，按部的拆卸了唧筒，並把它從淹沒的礦井中取了出來。

在『布將雷煤業托辣斯』所屬的『季米特洛夫』五——六號礦井裡，工人用手從十五公里以外搬

來了幾個極大的鍋爐」。

在所有收復區內，無論是工業中或農業中，都在進行這種恢復工作。

我國集體農民也表現了高度的公民自覺。留在鄉村中能獨立操作的男子，較戰前少得多。農業工作的主要重担落到了女莊員肩上。她們也在進行偉大的事業。在戰爭時期，集體農莊充分地以糧食供給紅軍和城市，而以原料供給工業，已是第四年了。差不多每個集體農莊都認為在繳納國家規定的糧額外，再交出一部分糧食作為紅軍基金，乃是自己的道德義務。

也許有人會說：這又與公民自覺，道德義務等有何相干呢？不要忘記，現時集體農莊內不僅機械力時常缺乏，而且牲畜力也不够，按時耕作，爭得良好收成，都要靠集體農莊大大緊張力量，並無論如何都要戰勝敵人的決心才能做到的。在勞動中表現這樣高度自覺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

莫斯科省科洛門區『五年計劃四年完成』集體農莊中，克魯托娃所領導的一個分隊努力耕作自己份下兩公頃地段的馬鈴薯，她們按時執行了一切工作，當七月炎熱，馬鈴薯有旱死的危險時，姑娘們就在分隊長領導下在集體農莊院內找到了一架舊救火機，修好之後就用它來澆水。結果克魯托娃分隊從每公頃土地上收穫了八十三噸馬鈴薯。

在塔什干鐵路上需要火速地擴大『狹小地段』；成千上萬的集體農民來到路基上，在十二天至十五天內就建成了第二條路線和幾條分路以及新的小分站。

我們知識界的創造精神和愛國主義積極性，在這次戰爭時日內達到了空前發展。從科學院及其所屬各研究院直到工廠中，礦井中和地質偵察隊中的工程師為止，處處都在不斷地創作着。蘇聯的教員，醫生，農業技師，戲子，美術家，作家都為勝利而貢獻一切，其工作結果不愧受到斯大林同志所給

的好評，他說：「俄國知識分子，在技術和文化方面，按照創新立奇的道路勇敢邁進，順利地向前發展現代科學，以創造精神把現代科學的成績運用去爲紅軍出產武器。蘇聯知識分子之創造性的勞動，對於擊潰敵人的事業給予了極寶貴的供獻」。

青年，尤其是青年婦女，在工業，農業，運輸業及機關中的作用，是極大的。他們要肩負着戰時工作的基本重担。而我國這些爲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所教育出來的青年，光榮地完成了黨對他們的信託。我國各工業部門中凡組織在青年隊內的男女青年，都執行了愛國主義者的義務，提高勞動生產率，使生產過程合理化，空出一部分熟練工人派到別的工業部門去工作。爲了明瞭起見，我來舉出幾個例子吧。

航空工業人民委員部所屬第四十五號工廠中，齒刮工人奧爾洛娃提議只用一個綜合的，可以把四次手續并作一次作的辦法去代替先前的四次鑽孔工作。結果製作時間縮短至三倍，鑿工秋林提議將零件的鑽孔工作從複式鑽孔車床移到鏤床上去作。他的提議實行後，結果製作時間縮短至四倍。

鄉村的青年也不落後於其城市的同志。到一九四四年十月參加青年拖拉機隊競賽的有二萬個拖拉機隊，共計有廿多萬拖拉機師，而組織在獲得高度收成的青年分隊裡的，約有四十萬青年集體農民。

沃龍涅什省布士林諾夫斯克區左雅·舍格達所領導的分隊的工作，是極顯著的例子。戰前左雅在學校裡學習。戰爭開始時，左雅的父親上了前線，她就決定在集體農莊中工作。不久農莊管理處指定了左雅當分隊長。該隊領到了一塊十五公頃的地段。左雅·舍格達及其女友在一九四二年的整個冬季，及一九四三年的春季和夏季都曾頑強地工作，學習，並採用先進的農學法來保證高度的收成。一九四三年秋這塊土地上的空前收成，即每公頃收穫了一百八十普特黃米，就是對這一頑強勞動的酬

答。

隨時隨地都見到的蘇維埃青年的緊張勞動，表明我國這一代青年人，際此戰爭嚴重時期在政治和道德方面都大大地成長了。善於以波爾什維克黨的理想和傳統及對祖國和人民的無限忠誠精神來薰陶青年的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在這方面是有不小的功績。

x

x

x

雖然，上面關於工人、集體農民、知識分子和青年所講的一切，不僅是指男性，而且女性也包括在內，但我還是想把婦女在這次戰爭中的卓越作用特別指出一下。大概婦女在俄國典型文學中所佔的這種光榮地位，是任何其他國家文學中所沒有的。在我國文學和我國歷史中，表現了高度道德精神的婦女真不知有多少呵！可是，以前的一切，較之目前戰爭的偉大史詩，較之那些表現公民英勇氣概和喪失親人時的堅定意志，以及鬥爭中表現空前偉大熱情的蘇聯婦女之英勇精神和犧牲精神，自然是大為遜色。

青年團員，女游擊隊員左雅·科斯莫鐵勉斯卡婭表現了最高的愛國主義和偉大的道德。她好像把我國人民在其歷史發展中所形成的一切優良情感都兼收並蓄於一身了。這已不只是俄羅斯人的女兒，而且也是不蘇聯人民的女兒，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女兒。法西斯主義者想以其野蠻暴行來侮辱蘇聯婦女，摧毀她們的德行。但它一點也沒有得到成功。左雅和其他蘇聯婦女的道德堅定性戰勝了法西斯蒂的獸性。

當然，蘇聯英雄左雅·科斯莫鐵勉斯卡婭是個超群的女子，但她是我國女子的典型，因為建功立業的潛在決心，在大多數蘇聯婦女的心靈中是始終具備着的。目前活生生的現實提供了我國婦女在衛

國戰爭時日中所盡量表現出的成手的英勇、忠實和酷愛祖國的例子。下面就是一些個別的例子：

奧里珈·吉洪米羅娃，是威特比斯克地方一個游擊隊裡的偵察員和衛生員。這位大胆無畏的姑娘屢次冒着生命危險去拯救同志。該隊隊長在沙兒波夫斯克森林裡一次戰鬥中受了傷。奧里珈給他綁好傷後，自己就帶着游擊隊向敵人掩蔽部攻擊。彈片炸斷了她的右手。同志們給她紮傷後，她又繼續前進。結果被砲彈擊中，又打斷了她的雙腳。她戰死了，但直到最後一分鐘都鼓舞着同志。

在游擊隊裡充當爆炸手的維拉·列索娃雅使德寇受了很多損失。她傾覆了三掛敵人列車和炸毀了許多敵人載重汽車。維拉因一隻腳受傷被擒，德寇爲要從她口裡得到關於游擊隊的消息，就在她胸前燒起一堆火來。然而就連這種非刑逼供也沒從維拉口裡逼出一句話來。她死去了，但什麼也沒洩露給敵人。

蘇聯英雄馬麗亞·巴特拉可娃少尉參加了防衛列寧格拉和斯大林格拉的戰鬥。一九四三年八月她自願參加自動槍連去當坦克步戰隊，當坦克步戰隊長被打死後，她就帶着戰士衝鋒，佔領了德軍壘壕。一九四三年九月強渡莫洛奇諾依河時，巴特拉可娃引導着喪失了指揮官的戰士去作反坦克的衝鋒。蘇維埃戰士們在這個英勇姑娘指揮下堅持了一百二十點鐘的戰鬥，並擊退了敵人的五十三次反攻。

女驅逐機師近衛軍中尉葉加特林娜·布達諾娃有次發現了前來轟炸我們列車的十二架德國轟炸機。於是大胆的女飛機師就衝入敵機群中。德寇驚惶失措了，忙把炸彈擲到空草原上，但當看見只有一架驅逐機時，就轉向這架驅逐機反攻。布達諾娃毅然迎戰，擊落一架敵人轟炸機，並把其餘的敵機打得四散竄逃。葉加特林娜·布達諾娃共擊落了二十二架德國飛機。

全國都知道奧列格·高射沃依的母親葉林娜·高射瓦雅的情形，她很瞭解，如果她的兒子及其同

志一被敵人拿獲，就有生命的危險，但她終究隱藏克拉斯諾頓的這些英雄青年團員，並盡力幫助他們。

蘇維埃國家中的生活把我國婦女提到了這樣的道德精神高峯。她們在這次衛國戰爭中所作的光榮事業和所表現的偉大愛國情感，定會鼓舞起名作家，名畫家和名雕塑家來描繪蘇維埃女英雄們的形像，使她們在藝術和文學中永垂不朽。

游擊鬥爭應當認為是在保衛祖國，捍衛本國人民免遭奴役者蹂躪中之最偉大的人民創造精神的表現。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斯大林同志發出了作游擊戰爭的號召。蘇維埃政權與人民間的聯繫，在這裡表現得最爲明顯。人民領袖，蘇聯全軍最高總司令和政治家的斯大林同志，比任何人都更好的瞭解這種號召的必要和意義。因爲當時人民很像一個手忙腳亂，猶豫不決，不知道怎麼辦的人，不知道沒有被徵入伍的人應怎樣具體地，實際地來保衛祖國？斯大林同志的號召却指給了出路，打開了人民熱情底閘門，指示了在游擊鬥爭中應用人民精力的方法。

人民領袖，這是多麼偉大的辭句啊！它不僅表示領導人民和軍隊，並且還表現了領袖與人民的融和，情感底一致，目的底一致。這就是斯大林同志的號召和指令之所以如此有效的原由。我們的游擊運動變成了逐月增長的全民鬥爭。在這個運動中我們的黨起了巨大的作用。共產黨員成了頭批游擊隊的創首人和組織者。游擊運動的成功主要是由於它的集中而有目的的領導。

我國人民在衛國抗戰中，先前也曾利用過游擊鬥爭方法。著名的游擊隊員鄧尼斯·達維道夫根據

一八一二年的經驗寫道：『我們的母國俄羅斯是多麼巨大呵！它那豐富的資源已使那些想損害它的光榮和生存的許多民族吃虧不少；但這些異族還不知道安在它地基下面的各熔岩層呢……俄羅斯還沒將其魁偉身軀全站起來，如果它將來有天全站起來的話，那它的敵人是會大吃苦頭的！』

的確，游擊運動在其幾百年的歷史上從沒有像在這次戰爭中這樣的廣泛普遍，這樣的帶全民性，因而游擊鬥爭也就從沒有像在這次戰爭中這樣的有組織，這樣包羅萬象。大批蘇維埃知識分子參加游擊鬥爭，是一件極可注意的事情。單是拿庫班克拉斯諾達爾名為易格納托夫兄弟游擊隊鬥爭的例子來看，就可見知識分子參加游擊隊的效果多麼大。

這支隊伍的指揮官易格納托夫在其游擊札記中敘述說，隊伍主要是由技術知識分子組成的，其中有工程師，經理，核算員，科學工作人員。所有這些都是城市裡的人，更恰當點說，是『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但激於愛國的熱情，他們拋棄了舒適的和慣常的城市生活，而來過那不適於他們的，困難的，充滿了不幸和危險的，山中游擊生活。他們都是能夠撤退，並在後方生產中去從事於國防工作的。然而在當時條件下他們認為不如把自己的力量用在與萬惡敵人直接鬥爭中更為有效。

這種鬥爭的半年總結是很驚人的：小小的一支隊伍顛覆了一百五十五輛載有砲彈，敵軍及其技術（坦克，大砲等等）的車箱，炸毀了八座橋樑，消滅了幾十輛坦克，小坦克，重砲，一百多門小砲和迫擊砲。敵軍官兵被打死了的約二千名，重傷者二千五百名以上。易格納托夫隊伍本身在這一時期內却只損失了五人，重傷二人。

其實如果估計到在隊伍裡還組織有給鄰近游擊隊培養地雷破壞手的特殊『地雷破壞大學』，那末，這個鬥爭的成果還要大得多，因為鄰近這些游擊隊所給予敵人的損失，有其單獨的數目。

易格納托夫隊伍的行動之所以這樣有效，大部分是由於他們內面有極熟練的工程師，技師和工人。這就不僅使游擊隊伍本身能很好的組織起來，而且也能够有計劃地，可說是用科學方法來打擊敵人。易格納托夫隊的隊員不僅把自己的感覺，而且也把自己的高度熟練技術，知識，各方面的才幹，智慧等一切都服從於奮身效忠祖國的事業。

蘇聯所有各族人民都參加了游擊運動，尤其是烏克蘭人和別洛露西亞人，其原因是很顯然的。關於游擊隊的豐功偉業已寫了許多書籍，現在正寫着，將來還會寫出許多書籍的。這裡我們只來列舉幾個例子。

別洛露西亞游擊隊在敵人深後方奪得了稱作「游擊邊區」的好幾個區域，弄得德寇簡直不敢在那裡露面。游擊隊也控制了一些別的區域，不讓侵略者把糧食和其他物品從那裡運走。在巴蘭諾維契省也是這樣。那裡人民復仇者在顛覆列車，打埋伏和公開搏戰中殲滅了三萬多希特勒匪徒。

一九四三年秋，德寇決定掃蕩在明斯克省留班斯克區行動的游擊隊。幾個武裝齊全的德國師圍帶着坦克和飛機包圍了游擊隊在其中隱藏着的森林。旅長薩蘇拉在敵人不斷炮擊轟炸，甚至沒有可能收檢傷者的情形下，用超人的努力帶領着自己的隊伍從泥濘沼地中衝出了重圍。當旅長受了重傷跌倒時，游擊隊員們就把他放在自製的抬床上抬走。抬的人非挺起身來走不可，一個接連一個的被擊倒（其中有六個被打死），但即刻就有新人來代替，於是帶傷的旅長連同其隊伍都逃出了重圍。

游擊運動的形式是各種各樣的。基也輔醫科大學教授布依科，在戰爭剛開始時就自願的上了前線，被俘，從那裡逃回了。他心裡燃熾着對德國侵略者的仇恨，於是去作秘密工作。布依科在法斯托夫城市醫院找着醫生工作後，就組織醫治紅軍受傷官兵的工作。他拯救了當地上千的青年，使他們逃出

被逐到德國去的危險，他和游擊隊建立了聯繫，並轉送人員到游擊隊那裡去。當他的活動被發覺時，他也（於一九四三年六月）加入了游擊隊。德寇終於抓着了布依科；他們將他全身淋上汽油，就活活的把他燒死了。

凡是德寇佔區域內的蘇聯各族人民都參加了游擊鬥爭，這一鬥爭顯明地向全世界表明了蘇維埃政權的人民性，表示了全民對蘇維埃政權的愛戴，及其爲保護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國家獨立而鬥爭的決心。這是最足以使人信服的蘇聯各族人民精神上政治上一致的證據！

一般說來，任何一種戰爭都是對一個國家的物質資財和其精神力量底考驗，而這次戰爭所要求於人民的物質力量的消耗和最偉大的堅定精神，真是空前所未有。許多有權威的軍事家也認爲精神的堅定，是獲得勝利的一個主要因素。

德拉郭米羅夫將軍在這方面的意見是值得注意的，他說：

「戰鬥中的勝利要求軍人在精神方面具有極大的毅力，具有頑強性和敏捷性；要有甚至在顯係沒有挽救希望時，也毫不喪失勝利信心的這種毅力，要有毫不放棄既定目的的這種頑強性，要有能在一瞬間，隨機應變，以達到既定目的的這種敏捷性」（策略教科書，第一冊，第三頁）。

「當一個軍隊中的兵士們充滿爭得勝利的決心，不惜以犧牲自己爲代價，則這樣的軍隊一定獲得勝利，因爲只有自己能够決心犧牲的人，才能殲滅敵人和戰勝敵人」（策略教科書，第二冊，第一〇頁至一一頁。一九〇六年版）。

這個意義的現代瞭解就表示在視死如歸這一口號中。但我們並沒把神秘的空想，個人的熱狂，死

得漂亮的願望放進這一口號中。我們並沒把死亡視作自在的目的，視作某種清高，超人的事。從我們觀點看來，死亡，這是對於每個人的最嚴重的打擊。

大概任何地方的人也沒有如在蘇維埃國家裡的人這樣的樂生。正由於蘇維埃人民具有這種樂生精神，所以當這樣的生活遭遇危險，當要為保全這個生活而進行生死鬪爭時，蘇維埃國家的公民就簡直喪失了對死亡的恐怖，這種恐怖心被那保全蘇維埃人民生命的意志所戰勝；他們覺得，保全蘇維埃人民的生命，就無異是永遠保存了自己的生命。共產黨員之慷慨赴義，並向敵人喊出：『我雖死，但我們的事業，是永遠活着的』，這種充滿深刻信心的語句，並不是偶然的。在這片刻內，這人的一身已完全與團體融合，在他看來，團體的利益高於一切，團體的利益重於死亡。這樣的意識使蘇維埃人成為大無畏的戰士。我們來回憶回憶那與幾十架法西斯坦克決鬥的二十八個潘菲洛夫師近衛軍戰士，回憶那挺身遮住德寇工程火力點炮眼的紅軍兵士馬特拉索夫，回憶那捍衛斯大林格拉要衝時帶着一束手榴彈撲到德寇坦克下的普拉托夫，回憶那以自己身體擋住德寇機關槍眼的愛爾志吉托夫等人的英勇功業吧。特別重要的，這些英勇功業並不是個別的現象，在戰爭進程中，我們的戰士和指揮官不斷的重複表現着這種英勇精神。

甚至在最困難的時候，當我軍不得不實行退却時，我軍隊伍中也充滿了對勝利的信心。紅軍兵士和指揮官都確信地向留下的居民說：『我們是要回來的，我們一定要來的』。這一確信不僅基於物質的前提，而且也基於我們人民精神的堅定和他們對我國正義事業的信心。誰也不能想像世界上會有這樣一種力量，能從我們人民手裡把蘇維埃政權奪去。這種情感一成為群眾的情感，就變成了物質力量，在西歐，人們却把這種物質力量視作奇蹟。而我們則認為這個信心，是測量蘇維埃政權力量的最正

確的尺度。

愛祖國是所有各國人民固有的天性。但關於所有各國軍隊，却不能這樣說。佛里德利赫第二的著名勃蘭登堡軍並不愛自己的人民，所以人民也不愛這軍隊。軍隊和人民是彼此仇視的。這個軍隊只是普魯士王掠奪計劃的工具，只是鞏固他對國民的權力。

佛里德利赫組織軍隊和教育軍隊的原則和方法，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直到近時，歐洲所有的政府還把這些原則和方法當作軍事理想，並力圖使本國的軍隊效法佛里德利赫的軍隊。自然，時間和發展對這種妄想作了一些修正，而大大加以限制了。可是，棍棒紀律，兵營成規，和外界隔絕，不問政治，禁止閱讀進步書籍，總之，一切使軍民互相隔絕的方法直到現在還採用着。在這方面，所有外國，首先是德國，直到如今還盛行着對毫無人道的棍棒紀律的崇拜。那裡甚至有小心防範，使和自己人民隔離，專為養育以戰爭為唯一目的的特種人的特區（東普魯士）。

不管俄國沙皇怎樣努力把普魯士軍事制度移到俄國軍隊中來，但並沒有完全奏效。俄國人比起德國人來，是另一種本質。所以諺語說：『俄國人遇着就健康，德國人遇着就死亡』，這不是無因的了。沙皇政府也使俄國軍隊遠遠離開人民的。但在它裡面畢竟經常有着真誠的愛國主義者和天才的統帥人物出現，他們忠實地服務於祖國，違反着上級的意旨，真正地改善了軍隊的戰鬥質量，並在戰鬥中提高其威信。

蘇維埃軍隊，是既不像先前俄國的，也不像歐洲任何一種軍隊的特別軍隊。它的成份是真正人民的。紅軍兵士和官佐出身於同一階級，這是舊時沙俄軍隊以及任何一種現代軍隊所沒有的。我們的軍隊在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方面都有無數線索與人民聯繫着。

在我國，人民與軍隊的社會聯繫表現於聯歡慰勞及其他的辦法。黨及其高尚思想在精神上把軍民聯合起來。我們的紅軍兵士和指揮官不僅注意故鄉生活，不僅關切祖國所發生的一切，而且還儘可能參加當地事務，且在絕大多數場合下，參加得很有成效。軍隊是極愛祖國的，而且不能不愛祖國，因為軍隊經常感覺到祖國對它的撫愛。

我國各族人民間底友愛是建築在它們利益一致底堅固基礎上。自然，這種友愛在軍隊裡也深深地感覺到。當然，這個友愛是與德軍官兵間的聯繫毫無共同之點的，那裡「友愛」的基礎是合伙打劫。那種著名匪幫的匪首，出發作冒險事業時，就招納一批較小匪股頭目來參加，但他却以蔑視態度對待那些小嘍囉。德軍在侵犯蘇聯時與其附庸國軍隊間，就是這樣的一種關係。這個「友愛」是不道德的，因而也是不堅固的，這在法西斯同盟的崩潰中表現得最好不過了。而且這點也是毫不奇怪的；因為法西斯種族理論的本身根本否認各族人民底友愛；而德國的整個政策就是以這一理論為基礎。

在和平時期懇懇培養起來的蘇聯各族人民的真正友愛，在戰爭年代就放出了燦爛的光芒，不僅使我們國外的敵人驚奇，而且也使我們國外的友人驚奇。這個友愛是在嚴重的軍事考驗中鍛鍊出來的。自然，它在戰線上特別地感覺到，那裡人們不斷地遭受危險，因而對於並肩作戰的同志也就應有完全信任。戰線是個試金石，人的許多感覺，包括忠誠和友愛，都受着它的考驗。蘇聯人民不僅在後方的友愛工作中，而且他們的子弟在戰線前緣上的行動中，也經受住了這個考驗。而這是必然如此的。我們的軍隊，是個友愛的家庭，那裡幫助同志是應分的事。救援急難好比兄弟的例子，差不多在我們報上所公佈的每個軍事通訊裡都可碰見。

在戰鬥平息時刻，友愛使戰線生活增添歡娛。一位年輕卡查赫人讀着妻子寫來說是生了兒子的一

封信，他就和同班弟兄們鄭重其事的討論該給小孩取個什麼名字。一個西伯利亞人寫信到戰線上敘述了集體農莊生活，收成等等情形。這些問題引起全體戰士，甚至先前在城市居住的人的注意；大家一定互相談論起來。總之，經常有一串串的問題來進行討論和交際的。

在我們軍隊中職位官銜的陞遷，是不管某個人所屬的種族和民族如何，而只問他的能力和戰功怎樣。這不只是形式——所謂按法律辦理，——而且紅軍兵士和軍官的輿論也促成這點。由此也就有着高度的道德水準。而在這種基礎上生長起來的個人友愛，甚至在彼此居住得很遠的人中也會維持很久。

對敵人的仇恨已深入於我們軍隊。德寇自己促成了這點。大概，全軍中找不出一個部隊，其中不會遭受德寇劫難的人：不是妻子，小孩被打死，便是老年雙親被殺，或是姊妹被趕到德國作苦工去了，更不用說財富被劫，房屋被燒毀的事情。

現在，當德國為聯盟國軍隊包圍日益加緊，戰爭已移到德國境內時，德國宣傳却裝腔作勢的哭道：戰爭變得愈益殘酷了，軍隊中喪失了古代騎士精神。顯然，這個宣傳是希望在聯盟國中找到傻子的。直接間接殲滅了幾千萬人的卑劣漢，現在，臨到要受報復的時刻，却回憶起騎士精神來了。

對法西斯惡徒的仇恨我們認為是神聖的。一個美國新聞記者，在對愛倫堡所著戰爭一書一般給予好評時，却加以指摘說，這本書因為裡面含有許多對德國人的仇恨而失其價值。這並不是偶然的意見。在美國也像在歐洲一樣，有很多人避免激烈的措辭，不用大的熱情來同法西斯主義作鬥爭。說什麼溫和穩健更為有效，仇恨是根本與人類的忠厚仁慈感覺相背馳。當然這是完全不合乎實際的。

外國批評家公正地認為俄國文學是偉大的和最人道的文學。比方波蘭文藝研究家亞歷山大·布留

克列爾在其所著俄國文學史一書的自序中寫道：「俄國文學，是世界上 youngest 的文學……但彌補它的幼年性的，却有它的創作中的豐富和特色，它的高度的道德價值，它對人道主義和愛他主義的宣傳，它分析人類心靈和生活現象的尖銳和明達，它的坦白和愛真理，它的民主精神等等特質。它使人敬愛它在自己國內所爭得的那種巨大意義，這點就大大超過世界上其他的文學……它成了一種講壇，從這講壇上面發出了捍衛仁慈、美麗、自由、人道的辭句；它成了社會良心的唯一表現……」

但對惡的仇恨是我們文學中，我們優秀作家作品中之鮮明的特點，這是最高尚的感覺和與人類敵人鬭爭最積極方法之一。

郭爾巴托夫在其所著中篇小說寧死不屈一書中，很好地描寫了對於德寇的仇恨。老人塔拉斯簡直不能設想，惡貫滿盈的德寇，竟能不受懲罰的逃去。於是他竭其全力來報復敵人。當德寇從城裡逃走時，他就沿街跑去，用手杖大敲每家的窻葉，連連叫喊：

「——喂，大家都出來啊！喂，德寇在開跑啊！莫讓他們跑掉，喂，男子們，快出來啊！頓時就有很多人圍聚到他身邊了。

——讓他們跑掉罷！——人群中有人叫道。——我們又沒有請他們來！謝天謝地，跑了也好！

——塔拉斯，你想幹麼？

——我們決不讓德寇走掉！——他叫喊說。——要在這裡揍死他們！

——塔拉斯，不用我們動手，有人要揍死他們的！……你要知道，我們並不是軍人。這不關我們的事。

怎麼不關呀？——塔拉斯吼了一聲。——怎麼不關我們的事呀？那末，又關誰的事呢？德寇不受

傷害的跑掉之後——又能重新來糟踏我們的生命，吊死我們的孩子。我們決不能讓德寇走掉呀！要殺死他們！活埋他們！

他大揮其手杖，急忙往城市中心跑去，連卡同他並排跑着。工人們從四方八面都跑出來了，很多人手都拿得有武器，也不知道這些武器是怎麼落到他們手裡的……

——唉，可惜，沒有槍！——塔拉斯一面跑，一面忿恨地叫道。——連卡，唉，可惜沒有槍！……他把自己那根多節的老人手杖，高高地舉在頭上。此刻他也沒有戴帽子，露出一個白頭，城市燒起的火照得臉上緋紅，他拿起這根手杖，真是威風凜凜，氣勢赫赫……」

我們會指出，蘇維埃道德發展的泉源。這些泉源應溯自我們遠古的歷史；掘發它們的任務，就落到了那些探究俄國人民以及居住蘇聯境內其他各族人民精神發展的研究家身上。我們只講到了很少幾個促進道德發展和把優秀德性培植於俄國社會的活動家。我國人們所具有的道德感覺，不言而喻的，是更加完備，更加紛繁得多。比方我還沒有講到，蘇維埃時代父母對於子女愛情的增長情形，婦女之日臻發展的自動性和獨立性等等。我主要地解釋人民政治上，精神上的特性，力圖指出那些促進抗敵的感覺。

我們的道德，如我說過的那樣，是由人民的優秀分子來發展和宣傳的。這點是應歸功於俄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歸功於俄國文學和藝術，它們效忠竭誠地與沙皇制度的黑暗勢力，與剝削者的殘酷寡情，與人民的愚昧無知鬥爭了好幾百年。俄國文學感化了人，迫使全世界承認它的高尚道德性。這種德性在蘇維埃制度下特別地提高起來和深入於人民群眾中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是發展我們共產主義道德的基礎。這是無待解釋的。蘇維埃政府，列寧——斯大林黨所具有的唯一目的，就是增進人民的

幸福，其一切行動都是針對着這一真正高尚的道德目標的。

斯大林同志用自己的全部事業證實着他所說過的以下的話，即他將爲人民事業奮鬥到最後一滴血。難道這不是人類道德的極度？我們黨，列寧！斯大林黨的道德，也就是我國人民的道德。它給了蘇維埃國家以巨大的抗敵力量；它鼓舞着工廠中和田場上的勞動者；它使在前線上的英勇精神成爲一種群眾的現象；它是勝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論蘇聯新道德

雅羅斯拉夫斯基

一
十月革命在人類史上開闢了一個新世紀。在極度紛亂和非常艱苦的環境中，千百萬人開始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這個新世界的生存一經開始，就顯示了它的精神美，顯示了它的牽引力，創造力，不可破滅的毅力。社會主義革命改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生產關係；它創造了蘇維埃公民新的道德風格；它制定了新的行爲標準，新的道德——共產主義道德。

每一個社會形態都會制定過行爲標準，道德標準；每一個社會都會創造過自己的道德。奴隸主，封建領主和資產階級，都會替自己的時代制定過自己特殊的階級道德，強迫整個社會採納這個道德，使那些在他們本身物質利益中生了根的，專爲守護這些階級利益而制定的行爲標準，道德標準，變成人人都必須接受的標準。

譬如奴隸制時代基督教會用它整個威信所支持和聖化的行爲標準，就是如此：

——奴隸要服從自己的主人。

這是奴隸主們爲了永久保存他們的制度，保存他們對被奴役的大衆的生命勞動和一切財產的支配權，而對他們的奴隸所宣佈的一道『無上命令』。祇要研究一下各種宗教學說，就容易看出：每一個

社會形態裡的統治階級都企圖用上帝和宗教的名義來制定爲這個階級所需要的，因而被他們奉爲『全人類』道德的峯的行爲標準。聖經上的十誡是有錢的畜牧主、封建領主和地主們爲了防衛自己的利益而對整個社會所宣佈的戒律。

但是這一類奴隸制道德、封建制道德，或者後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不能成爲全人類的道德，人人都適用的道德呢？當然不能，這是因爲上述這些社會分裂爲許多利害不同的不調和的敵對的階級。凡是有利於資本家或地主的東西，便有害於人民大眾，人民大眾對於強迫他們接受的有利於剝削者的道德，是永遠不能調和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和薄情的現款關係之外，沒有在人與人之間留下任何另外的關係』。資產階級把人類一切感情淹沒在自私的打算的冰河裡。他們『把人的身上價值變成了交換價值』，把『無廉恥的商業自由』放在一切自由之上。他們『把那些直到現在還被認爲是可尊敬的各種事業的聖潔榮光剝奪殆盡。他們把醫生、法官、牧師、詩人、從事科學的人變成他們金錢雇傭的工人。他們從家庭關係上撕去感情的外衣，引到純粹金錢的關係上』。還在資本主義的黎明期，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霍布司就形容過資本主義的獸性的『道德』，說：『人對人的關係就是狼對人的關係。』對落後者和弱者的壓迫，剝削和鞭打——就是資本主義的『狼的法律』。

這就是資產階級的道德，市儈的道德。

二

『……從來一切道德理論歸根結底都是一定的社會經濟情況的結果。但因爲從來社會都是在階級

敵對形式上發展的，所以道德也都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爲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作辯護，或者當被壓迫階級成爲實力充足的階級時，它對這個統治就表示不滿，而防衛了被壓迫者的未來的利益」。○（恩格斯）

伴隨着舊社會統治階級道德的退化，在另一極端上，一批持有另一種非貪慾的，非掠奪的，而是真正人的觀點的人物却生長了。他們所制定的行爲標準是適合於整個勞動人類的。

在馬克思以前的時期，空想社會主義者就是這些新的未來人類的思想代表。但他們所指示的走向自由和幸福的道路是不切實際的，空想的。祇有在新時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成了社會主義的真正科學理論的創造人，他們以這個理論武裝了先進人類。

當俄羅斯先進工人反對沙皇專制的時候，他們創造了自己的布爾塞維克黨，這個黨的黨人畢生獻身於人民的事業。當還沒有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社會主義社會，人民還在遭受地主和資本家的壓迫的時候，這些人，這些未來的人就已培育了一批新道德，社會主義公民道德的實行人。

對於布爾塞維克，社會主義利益和革命利益永遠是滲透着他們整個存在的生活的最高法則。布爾塞維克黨的一切決議正是以這個最高法則——革命利益——爲指針的。他們的整個『道德法典』滲透着同樣的思想，服務於革命鬥爭的同樣的需要。革命利益決定了布爾塞維克黨人的行爲，決定了他們對家庭、對婦女、對孩子、對國家、對其他階級的關係。

列寧的生活，斯威特洛夫、吉爾盛斯基、凱茨霍威利、巴布希金、奧卓尼基茨、基洛夫、傅龍芝、庫比雪夫，以及已去世的其他許多人的生活是峻嚴的，同時也是美麗的。布爾塞維克黨人爲了進行革命鬥爭，不惜犧牲一切。爲了革命，不惜在斷頭台和拷問室裡跟生命分手，或者在艱難貧困中積年

累月的進行着被放逐被迫害的革命地下工作者的艱苦鬥爭，積年累月的在沒有家屬、沒有親友、沒有庇護，經常流血報復的威脅下，被禁錮在監獄中，苦役營中。

自然，黨沒有用銅牆鐵壁來隔離軟弱動搖的，小資產階級動搖性的人物。這些人也會混進黨內。但決定黨的面貌、黨的道德風貌的不是他們。恰恰相反，黨從來跟他們進行鬥爭，從它隊伍裡把他們清除出去。

黨在革命鬥爭中鍛鍊了一代傑出的人物，他們能為革命的勝利忍受最大的犧牲，供獻出一切直到最後的一滴血。黨鍛鍊出一批人物，他們能為人民而犧牲一切，能領導民衆跟自己走。

試想，如果不學習列寧和斯大林感動千百萬勞動者心靈、感情和思想，不在精神上鼓舞他們完成偉大的功勳，難道我們能取得一九一七年十月的勝利嗎？敵人在數量上大過我們不知多少倍。他們有軍隊，警察，法庭，教會，他們手中有報紙，學校。但布爾塞維克黨有科學學說的武裝。它在它黨員中鍛鍊和培養成的對一切勞動者的行為標準是如此正確和完全的反映出人民的利益，以致它能迅速發動千百萬群衆參加勝利的衝鋒。

正是布爾塞維克黨的這種不折不撓的工作，造成了在爭取社會主義鬥爭中，提鍊出蘇維埃社會不可思議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黨和全蘇聯人民的一致。

讓我們回憶一下N·奧斯特羅夫斯基在『鋼鐵是怎樣鍊成的』一部小說中所描寫的那些革命初期的情形。百分之五十的布爾塞維克黨人被動員到國內戰爭的前線。在靠近前線的一帶，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個個都被動員了。不可想像的破壞，寒冷，缺乏一切物資，以至於我們不得不成立這樣一個組織，叫『乞克瓦拉浦！』現在很多人都弄不明白這個字的意義，它就是：『軍隊棉胎革鞋供給非常委員會』

——就在那樣的環境中，當城市勞動者祇分到一百格蘭姆麵包，而且還不是每天都有，有時祇分得一個粗穀和燕麥做的黑麵包的八分之一的時候，當飢餓，空扶斯蹂躪我們國家的時候，——就在那樣的環境中，蘇維埃人民表現了偉大的精神上的剛毅，能够擊破十四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和武裝干涉，粉碎國內和國際的反革命，而建設新生活！

真的，未來的一代會驚異於蘇維埃人的英勇，因為他們爲了新的人類社會的幸福能够作這樣多的犧牲。這種忠實於人民利益，社會主義利益，在鬥爭中的堅忍不拔，以至準備作最大的犧牲，——就是蘇維埃人道德風格上的重要特徵。

布爾塞維克黨，以列寧斯大林的道德政治風格上的各種特徵去教育全國勞動人民。

斯大林同志在競選演說中指出人民對他們所信賴的人有權利提出怎樣的要求。人民的當選人應當永遠重視放在他們面前的任務；他們應當是個像列寧那樣明確和確定的政治家，像他那樣不怕鬥爭和對敵人無情的人；他們應當不管環境怎樣複雜和危險而毫不恐怖和類似恐怖；他們應當在決定複雜問題時，需要各方面辨別方向和各方面考慮得失的時候，有大智而不急躁。他們應當像列寧那樣公正和正直，像列寧那樣愛自己的人民。

斯大林同志自己就輝煌地體現了列寧的這些特徵。

三

在過去決定和今天還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決定着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的許多舊行爲標準之中，最野蠻的是對婦女的關係。凡是政權在剝削者手裡的地方，那裡的婦女便成爲沒有平等權利的存在。

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法裡，有些特殊法律完全和宗教的教條相適應，限制婦女的繼承權和她們對

兒童的所有權，至於有許多國家的婦女被剝奪選舉權，那是更不用說了。千百種最醜惡的法律都是在反對婦女，把她們置於不平等的地位。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婦女受着雙重壓迫：勞動婦女一方面作爲被壓迫階級和另一方面作爲婦女在受着壓迫。

但是世界各國的革命鬥爭史中出現過不少傑出的女子，她們顯示和男子一樣並有同等能力完成最英勇的事業，和絕對效忠於人民。

法國公社女社員魯依斯·朱謝爾，俄國克魯布斯卡婭，外國干涉時期在奧得塞做地下工作的法國女共產黨員祥娜·略布爾，西班牙的桃羅萊斯·伊巴露里和里奴·奧登娜，以及蘇聯內戰中和社會主義勞動中的女英雄，都是值得回憶的。

我們祖國給革命獻出了女工瑪爾芙·耶科萊萊瓦，她是工人婦女中第一個在奧布和夫保衛戰時期不惜以生命來爲人民的事業奮鬥的。我們國家教育了許多婦女，她們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踏上街頭，在爭取人民解放的事業中用自己的胸部去抵擋刺刀。

在革命內戰的炮火中，在飢寒中，鍛鍊出新的女英雄，我們女共產黨員和女青年團員，效忠於革命的黨外工農婦女，好幾次站在敵人七發槍的槍口面前。她們爲革命和爲人民而成仁了。

革命鬥爭中的男女平等，產生了對婦女的新關係，如果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在統治階級環境中，家庭是爲經濟上的打算而結合的話，那末，我們蘇維埃新家庭就完全爲另一個原因而結合。新的婚姻之不同於過去的婚姻，不僅在於它不需要牧師的同意和教會的同意，而且在於家庭性質已起了根本的變化。在蘇聯新家庭裡，男女經濟上是平等的，大多數場合下是經濟上互不依賴的。這是共同培育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新的一代人物的家庭。這是完全參加在這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家庭。這是新家庭！

反對那些與新關係對立的老年父母的意志，孩子們往往從周圍環境中吸收了新的思想。巴夫里克·莫洛佐夫便是一例。在他家庭裡看到的周圍盡是難理解的人物，但這位蘇維埃小公民已經吸收了新世紀的思想和道德，他爲了新的社會主義的利益，爲了新的人類道德的利益，絕不顧慮一切的反對了落後的陌生的，與他自己敵對的家庭。

我們一方面要反對一切反動的舊習慣的殘餘，反對人們意識中的一切資本主義殘餘，反對漠視社會罪惡的輕率人物，反對以剝削者的庸俗態度對待婦女、家庭和兒童，反對無賴漢行爲，反對貪婪、懶惰、草率，反對一切宗教偏見和民族成見。

但還要看出黨所培育的，健康的蘇維埃家庭、蘇維埃學校、蘇維埃文學、蘇維埃藝術、社會主義工場和社會主義田野上的勞動所給予的，我們整個生活所給予的優美、偉大、嶄新的東西。

四

蘇維埃公民的新的道德風格是由社會主義勞動鍛鍊成的。列寧說過，推倒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這一件事，祇是任務的一半，這一件事是已經做完了的。資本家地主現在祇能在博物院裡看得到，他們再也不會蘇維埃生活裡現形了。

但是另外最困難的一半任務是養成新的對勞動的態度。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勞動是一付重担，因爲勞動者是替資本家做工，不是替自己做工。在蘇維埃國家裡，需要新的勞動習慣，新的對勞動的態度。因爲現在我們的政權是握在勞動者自己的手裡，他們自己是一切生產工具的主人。

但是確定新的對勞動的態度，新的社會主義的勞動紀律却並不簡單，並不容易。排除和拋棄舊的

心理也並不容易。這需要積年累月的時間。列寧繼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後不止一次的說過，取得政權之後的工人階級不但重新教育別人，而且還要重新教育自己，要擺脫生來就染上的資本主義污點。人的意識落後於經濟的發展。我們的經濟是新的，社會主義的，而意識中却還潛留着舊的殘餘，資本主義殘餘，宗教偏見，民族成見，小資產階級局限性，行會手工業情緒，這些殘餘必需堅決的加以克服和根絕。

對於幾百萬正直的蘇聯社會勞動者，勞動在蘇聯已成了光榮，剛毅和英勇的事業。產生了比舊社會會更高的新人物，也產生了比舊社會會更高的勞動紀律、勞動組織、和勞動生產率。

當海外得到斯泰哈諾夫運動消息的時候，資本家的報紙起初是誇張，說斯泰哈諾夫運動者是一種有魔力的特殊人物，巨人，而且祇有這種人能成爲斯泰哈諾夫運動者。後來當斯泰哈諾夫運動成了群眾運動的時候，他們又想出新的說法，說斯泰哈諾夫運動者的能够形成，祇是暫時的，最多祇有一個月的时间，而後就會精疲力盡，不再會有斯泰哈諾夫運動者了。

蘇聯人讀到這些，覺得可笑。社會主義社會已制定了新的對勞動的關係。蘇聯公民日漸認識，他們應該養成全新的人的態度，去對付婦女——他們的同志，對付兒童——未來社會的建設者，對付他們的勞動，對付他們所工作的機器，對付他們的一切工作，對付他們的國家——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祖國。

五

蘇聯人的新的道德特徵之一，是他們對祖國的關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時會說工人沒有祖國。事實上，如果這個祖國祇是叫工人受難，如果這個祖國對於勞動者祇是壓迫的工具，如果這個祖國使他們的整個生活陷於飢餓和失業，使他們的孩子無家可歸和無人教管，使他們的女兒被迫賣淫，那他

們在資本主義下有甚麼祖國呢！

社會主義社會培養了另一種對自己祖國的道德。幾百萬勞動者第一次爭得了自己的祖國。他們過去一無所有。他們現在甚麼都有了。

在蘇維埃國家裡，展開在勞動者面前的是廣闊愉快的遠景。在他們面前的是優美的生活。他們獲得知識不僅是爲認識世界，而且是爲改變這個世界，使它根本上服從勞動者的利益。他們現在果真把它改變了。我們的舊城市在年輕，在改觀，新城市在成長。代替可憐的貧血的農民的小塊土地，百花盛開的原野和花園像廣闊無涯的地毯一樣在伸張；沙漠上在開鑿運河，過去不毛的土地在受灌溉。蘇聯人看到他們從一九一七年十月以來擁有的力量是多麼偉大，看出這個改造力量是多麼強大。他們以任何時代勞動者從來不會有過的愛戴，去愛他們第一個社會主義的祖國。

蘇聯人在保衛祖國、對敵人的戰鬥中，顯示了極大的勇敢和無畏的榜樣。

這就是蘇維埃的愛國主義。蘇聯人想飛得最高和最遠，射得最準，做得最有效，學得最好——這志願，就是由這裡來的。偉大的全民族的新泰哈諾夫運動，就是由這裡來的。

蘇維埃的愛國主義是和國際主義不可分的，是和親如手足的國際團結的感情有機地聯系着的。蘇聯勞動者所培養的道德標準，所顯示的新人類的關係，是未來全體勞動人類所要接受的。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列寧在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指示過應該怎樣建立共產主義道德的問題。他認爲這個道德應該服從於革命鬥爭的利益。每一個人評價自己的步驟和審查自己的行爲，應從下面一個觀點出發，即：這對於革命事業是否有利，是否有益，是否需要。今天蘇聯人也正以行爲必需依據革命利益的需要來做他們生活的準繩。

（葉文雄譯）